

中国聚焦 郭良平

中共反思苏共亡党的局限

在苏共亡党亡国后这30年里，中共进行了大规模、长时间的研究和反省。这是一个列宁式政党对另一个列宁式政党的检讨，一个苏式制度对另一个苏式制度失败原因的分析；起点和落点都是捍卫和巩固这个基本制度。这个前提限定了它探讨的视角和深度，以及所得出的结论。

反思的结论与对策

综合最高层在各种场合的论述，中共得出的结论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：“前苏联没有解决‘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’的问题”“苏联模式本身就有许多弊端”“腐败问题越演越烈”“失民心者失天下”“没有实行改革开放”“很大程度上与法治不彰有关”“搞历史虚无主义，思想搞乱了”“理想信念已经荡然无存”。

根据这些结论，中共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性的措施，包括大规模反腐和从严治党；恢复意识形态信仰、强化思想政治工作和“不忘初心”的教育运动；严守“党指挥枪”的原则；推行依法治国和治理体系、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等。重点是恢复信仰。

这样的结论和应对措施使外界很感意外，因为“苏东波”后人们普遍认为马列主义已经破产了；但它凸显了中共反思的鲜明特点和局限性。这些局限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：体制框架的局限、意识形态的局限、代际因素的局限。

体制框架的局限

这个框架的实质是权力结构和它的组织体系，是当代中国全部秩序的核心，里面编织着盘根错节的各种利益。维护好这个框架，保证它不像苏联那样分崩离析，是改革的底线，也是中国式渐进改革成功的前提。苏联的“休克疗法”破坏了前提，结果是红色帝国的崩溃和经济一落千丈。

但这种渐进方式也导致了改革的路径依赖，也即局限性。最根本的局限也是这个体制优势之源——共产党本身。40年的改革引起了经济社会天翻地覆的变化，但主持改革的共产党本身基本没有变，仍然是列宁式政党。它的权力结

构，组织形式和运作方式都是在革命年代形成的，这样一个革命党如果脱离了革命运动，就会沦落为一个守成的官僚体系。

苏联模式的种种弊病都源于这个由革命退化来的官僚体系。它的权力结构、利益格局和官场文化等，将各级领导干部放在大小独裁者的地位上。所谓党风问题的实质是权力结构问题。

毛泽东力图避免苏共蜕变为“苏修”的宿命，不断地发动各种运动来保持革命热情与老百姓的鱼水关系，用“继续革命”来搞建设，用“破”的手段来搞“立”。显然，革命和建设不是一回事，他搞砸了。

从毛时代起，“一收就死、一放就乱、一乱就收”，是这个制度运作特有的节奏和周期性，因为权力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秩序来保证经济社会稳定。权力的运行需要在思想上、行动上保持上下一致，全国一心，于是就有了意识形态正统，庞大的宣传和政治思想工作机器，就必须不断强调纪律、忠诚和服从。在这种情况下是很难进行真正的反思的——所有的反思都同当下的政治、政治正确和正统教条相联系。

只有最高层有反思和理论创新的自由。他们在权力金字塔的地位，决定了他们的话都是“一句顶一万句”。一个不成熟的想法，甚至一句蠢话到下边，都会有大批人著书立说作报告来证明它的深刻、英明、伟大、正确，抓住为紧跟办表衷心的机会。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，最高领导都力图在正统之上搞些锦上添花，打上自己的烙印。政治正确、党八股、思想僵化、缺乏即时纠错机制等，是这个体制固有的倾向。

改革开放中，意识形态松散造成了“政令不出中南海”“九龙治水”和腐败的乱象。尽管这个“放”的时期成就了中国经济的奇迹，但它造成的“思想混乱”也威胁到共产党组织的根本，故当前的“收”是必然的。与毛时代不同，这次“收”是通过大量制度建设来实现的，其结果有可能不同于以往，但“收”通常带来的寒蝉效应是无可否认的。

不让人讲话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统治术中的一个重要手段，秦始皇焚书坑儒、汉武帝罢黜百家、各朝各代的文字

狱等都是如此。改革开放之初，邓小平提出“不争论”有其道理，因为当时中国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重大缺陷。

40余年后的今天，中共在实践上不再理屈词穷，理论上创新应该有底气，但众口一词仍然是统治者的理想。不允许放开讨论，是形不成超越领导个人的共识的，也很可能限制中国的发展前景，降低了民族复兴能够达到的高度和水平。

意识形态的局限

此局限有两个来源。第一个是马列主义本身的局限性。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工业社会的早期，所根据的和针对的都是19世纪和20世纪前半叶，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的悲惨境遇。它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仍然切中要害。但在肥胖症泛滥的今天，它的革命意义，特别是暴力革命的意义大不如前。

它的一些基本理论和观念，如阶级、阶级斗争、无产阶级专政、消灭私有制、按劳分配、劳动价值论等等，尽管与现实脱离甚远，很具破坏性，但仍在禁锢着一些共产党人，尤其是掌握政权的共产党人的思想。

第二个局限性的来源就是上述意识形态的组织功能。换言之，意识形态起着维系党组织和党内权威的合法性的作用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而且，它还被认为共产党人道德情操的支柱，习近平就概括得非常精辟：“马克思主义政党一旦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，就会土崩瓦解。共产党人如果没有信仰、没有理想，或信仰、理想不坚定，精神上就会‘缺钙’，就会得‘软骨病’，就必然导致政治上变质、经济上贪婪、道德上堕落、生活上腐化。”

因此，维护意识形态正统是掌权者的必修课。从毛泽东到习近平都要求党员干部读马列经典原著，检查思想，以提升党性和维护党的纯洁性。在此情况下，对意识形态作任何改动都很困难，僵化的趋势始终存在。

代际因素的局限

集权体制下的官方话语体系，基本上是最上层独白的产物。对刚走入社会的年轻人来讲，国家领导人都是“老前辈”，同他们隔着两三代。他们的成长

经历、世界观、价值观和理想等都是在一个不同的年代形成的，但却深刻影响着当今的政策走向和制度改革。而在世界各地，新技术革命时代引领潮流的都是年轻一代。

当今最高层的政治取向明显地带着那个火红年代的烙印，他们向往激情的生活和轰轰烈烈的事业。文革中的成长经历使他们习惯于敌我思维和“统一思想，统一意志，统一行动”，甚至连语言都是那个年代的，如撸起袖子加油干，抓枪杆子、刀把子，事事都要“一分为二”，抓主要矛盾，讲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等，这些都是他们从小吃透在心的。

这种由代差产生的认知和意识形态滞后是这个政体的特点。滞后造成放弃，放弃引起危机，危机导致回归、强化和再次滞后，这就是一部改革开放的思想史。

认知和政策效应

这些局限的最大效应，是中共当局从精神而不是物质层面上来梳理和解决其他所有的问题，比如上面提到的“补钙”，还有“革命理想高于天”“理想信念滑坡是最危险的滑坡”，以及要“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”，重塑共产主义信仰。这里的基本策略，是在不改变权力框架的情况下，通过改变观念和情

操来改变行为，使它回归“为人民服务”的宗旨。

再如对苏共垮台的诊断是理想信念的丧失。中国人常称俄罗斯为“战斗民族”，其定义里就包含了不缺乏血性男儿的意思。那么苏共崩溃时为什么没有“男儿”挺身而出？这是因为苏共的意识形态在实践中出了问题，没有说服力了，男儿站出来时会觉得理屈词穷，缺乏道德的勇气和真理的力量。

人心相背时，再强大的维稳机器都形同虚设，正如战无不胜的苏联红军在苏共落魄时，作了缩头乌龟一样——那些党员、政委统统没用。

重思想教育而轻体制改革是本末倒置。斯大林模式（及其衍生品）的基本矛盾，是“人民当家作主”国家的执政党和政府，在结构性特权下不断走向人民的反面，最终被人民抛弃。向传统模式回归的最大危险，就是将这个基本矛盾保留下来重新发酵。苏共党员干部的信仰是被现实粉碎的，要恢复这个信仰就必须对现实作出调整，包括对体制做出重大创新改革。中共在“苏东波”后所作的改革和调整，是否足以避免重蹈苏共覆辙呢？

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
东亚所高级研究员